

学术 视点

谈文 论艺

《文史知识》四十年：与历史对话 与时代同行

本报记者 谢颖



创刊时期编委及学者在北大

1981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文史知识》顺应传统文化热潮，应运而生。40年来，《文史知识》已成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宣传的重要阵地。4月9日，中华书局在京举办了《文史知识》创刊40年座谈会，《文史知识》新老作者、新老编辑、各级领导和各界朋友共计50余人参加了当天的座谈。

“诗文欣赏”“文史百题”“文化史知识”“人物春秋”……据编辑部介绍，《文史知识》有常设栏目20余个，并不定期地与各地学者、研究所、博物馆、文化机构、地方相关单位合作推出“特别关注”或者“特刊”，坚持开门办刊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办刊理念。创刊40年来，《文史知识》兼顾知识性、趣味性、准确性，主动占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阵地，在坚持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从新的角度为广大读者介绍新的知识。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新文至今仍记得大学期间在《文史知识》上第一次发表文章后的惊喜和感动。从那之后，他便成了杂志的忠实粉丝，与《文史知识》结下了跨越30余年的不解之缘。“在我看来，《文史知识》正是代

表了一份严肃期刊的独特魅力，它不仅向读者传播了文化和历史的知识，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袁新文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兴涛对此高度评价肯定，“《文史知识》刊发文章，从来都是有选择性的，选择那些时代需要的、大家关心的文史类知识，以准确、前沿性的内容提供给读者。它既能够向大众传播，又能够给专业学者以启发。”

这种独特魅力所彰显的正是《文史知识》“与历史对话 与时代同行”的办刊理念，“大专家写小文章”的办刊特色，以及普及中国古代文史知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办刊宗旨。中华书局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徐俊表示，《文史知识》的创办，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渴望读书、渴望知识的时代心声，反映了中华书局以及老一辈出版人和学者，对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执着信念和孜孜以求。“《文史知识》把中华民族最有代表性、最优秀的东西介绍给广大读者，读者看了感到自豪、骄傲，无形中产生热爱伟大祖国，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心和信念。”《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主编杨之是《文史知识》最早的编辑之一，在他心

中，这是一本普及文史知识的刊物的最大贡献。这种爱国主义教育不是硬性灌输、空喊口号，而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进行着。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随着信息传播方式、手段的不断更新，广大读者的欣赏品味也不断提高，这些都对传统期刊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史知识》也与时俱进，许多新栏目随着时代产生，这些新栏目，有的关注时代热点，针对一些有新意的话题组织集中讨论，有的围绕重点专题进行系列阐发和介绍，都很好地提升了刊物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对此，杨牧之感到，从《文史知识》40年来刊发477期的情况看，选题与内容，非但没有枯竭，反而有源头活水。因为社会上不断出现一代又一代新的读者，因此在需求上就需要重要的文史知识不断反复传授，而且，这种传授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随时代的前进、形势的变化，要以新的发现、新的角度，去做新的诠释。

近年来，虽然面临着电子刊物和新媒体的冲击，但是《文史知识》在刊物的销售上仍然保持了稳定，2019年来销售总码洋提升45%以上，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中华书局总编辑、《文史知识》主编周绚隆指出，《文史知识》之所以能成为一份为广大读者普遍认可的刊物，就在于它既有关历史的人文情怀，又有立足当代的现实责任。对此，每一个参与刊物编辑工作的人，务必要有深刻的认识和领会。只有始终把这种理念贯穿在日常工作中，这份刊物才能永葆它的生命力，才能让传播的知识变得更有魅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受到了全社会空前关注。徐俊表示，中华书局和《文史知识》杂志，将会更加主动地肩负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重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和学术态度，不断增强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善于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理论热点问题和文化焦点问题，善于引导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辩论和争鸣，善于用现代方法激活历史文化资源，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和思想财富，继续做好文化普及的倡导者和优质资源的提供者。

艺文 从谈

新时代需要发扬“三牛”精神

董亚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华诞之际，带领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新长征需要新的精神，新的精神指引新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理念来引领的。”“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百年大党的经验和智慧，“精神指引”是这一经验的新时代运用，也是开辟新征程的理论自觉，从一开始就注重精神的养成，用共产主义精神引领全面现代化建设，可以保证现代化的政治方向，体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形成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2020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强调：“我们要深刻铭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百年艰辛历程，发扬为民族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永远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的清醒头脑，永远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前进。”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牛”精神就是新时代所需要精神的精神生论诠释，这种精神是党的性质宗旨的生动体现，是党的革命文化的精髓，是对中国精神的进一步深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精神作为一定上层建筑中最本质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引领着社会发展。精神虽然从根本上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却联结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反映着社会的基本结构，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实践感》这部著作中提出，“精神、信仰等属于象征资本”的范畴，“社会信任和经济资本的生产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精神可以成为人们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成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内在要素，发挥着社会制度规范不能起到的独特作用。一个社会，如果形成精神，即使社会制度规范不完善，也可以较好地运行；但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制度规范，没有精神作为人们的行为支撑，就会产生社会失序。因而对于精神，我们不能

仅仅从“物质—精神”这一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理解，也需要从规范的视角，探讨其在社会系统中的重要功能。从这样的理论视角出发，“三牛”精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要深刻理解“三牛”精神，也必须从精神所赖以产生的时代特征出发，深刻把握时代与精神之间的内在逻辑，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扬“三牛”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为人类历史文明开辟新道路的历史使命。正是在为人类解放和自由事业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才得以彰显，奋斗价值得到实现，人生得以升华。这就意味着“三牛”精神建立在超越个体利益的社会共同利益实现基础上。共产党作为带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和自由的历史主体，注定了要用自己的艰苦奋斗，甚至牺牲来换取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和世界大同。因而，无论是“为人民服务孺子牛”，还是“创新发展拓荒牛”，抑或“艰苦奋斗老黄牛”，都体现了党超越自身特殊利益的共产主义精神。

“为人民服务孺子牛”精神是党的初心与本质，体现着党的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可以说这是党最大的政治。正是由于“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对人民才会“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才不会对人民“横眉冷对”，才能从根本上反对特权思想，像“孺子牛”那样，坚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牢牢树立人民公仆意识，保持党的人民性。“孺子牛”精神还体现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不回避问题和矛盾，勇于担当，“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既要正视新发展中面临的挑

战和问题，也要用前瞻性眼光预见现代化中客观存在的风险，尤其要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解决西方发达福利国家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

“艰苦奋斗老黄牛”精神是党实现初心为民服务的手段和路径，是党的革命文化的生动体现，体现了党的革命性。党的八大后，毛泽东同志在《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中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这体现了党执政后，对为人类解放事业不断革命这一历史使命的清醒和自觉。“老黄牛”精神要求全党为了实现全面现代化必须不断努力，永不停歇，反对精神懈怠，贪图享乐思想，发扬保持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老黄牛”精神还体现为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像老黄牛那样，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不计较个人功名，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坚定信念，为社会和人民不断积累财富，让人民群众先富起来，甘于为他人作嫁衣，为后人作铺垫，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

“创新发展拓荒牛”精神是党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体现。人类自由和解放离不开创新，经济生活需要不断发展。改革开放后，当我们遇到挑战、徘徊不前时，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正是由于这种开拓创新的勇气，我们党才不断带领人民摆脱困境、创造历史，进入了新时代。“创新发展拓荒牛”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不断开拓创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越是艰险越向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不断学习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和人类历史文明的先进经验，用包容开放的胸怀，像“拓荒牛”那样，勇往直前，用创新的理论，不断开辟新视野新天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为人类现代化开辟新的道路，创造人类新的文明。

（作者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北京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促进新时期中华豫剧发展

评《梨园芳华》

王钦韶

1月7日，河南省政协原主席王全书同志，委托工作人员给我送来一本他的新作《梨园芳华》。得到赠书，如获至宝，决心仔细阅读。随着品读的深入，一个“新时期中华豫剧发展非比寻常的促进者”的形象站立在我的眼前。

书中辑录的35篇文章多为讲话、发言、访谈录、序等，角度与侧重点各不相同，有总结，有要求，有建议，有动员。他以“全身心地投入”的姿态，秉承“提倡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警惕什么，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原则，甘当新时期中华豫剧发展的促进者、引领者，豫剧发展壮大支持者，戏曲艺术人才的培育者，中华豫剧文化的深层挖掘者。

在此，谈几点读后感。第一，对豫剧研究空间、深度的重新定位。“豫剧”顾名思义是河南戏，是地方戏；但又不是—般意义上的地方剧种，而是一个远远突破地域、在全国广泛流行的一大剧种。王全书同志创建的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在“豫剧”前冠以“中华”二字，后面缀以“文化”二字，就成了对豫剧空间、深度的新定位。

第二，梳理中华豫剧历史，为总结中华豫剧发展规律提供史料支撑。一是考证梳理了中华戏曲和豫剧的渊源与脉络：“中国戏曲肇始宋金，初盛于元，繁荣明清”。“明初朱棣、朱有墩父子驻藩开封，组建戏班，编演杂剧”。开封一带演唱的“汴梁腔”“土梆戏”堪称“河南梆子腔体音乐的先声”。开封南朱仙镇的蒋门，开封北清河集的许门“办班传艺”，培养出了最早的舞台名角，其唱腔就是豫剧祥符调的“母调”。道光年间黄河两次大决口，把蒋门所在的朱仙镇变成泽国，蒋门第三代“管主”蒋孔子带领劫后余生的艺徒及其唱腔祥符调去商丘落脚，与当地的唱法融合而为“豫东调”，在商丘和豫、皖、苏交界地带传播开来。豫剧于“清代乾隆年间诞生”，生长于河南民间，有旺盛的生命力。由“仅流行于荒村野野”而进入城市的“茶园”“茶社”，民国初年“天兴班”开始卖票营业。发展速度愈来愈快，剧本愈创愈精，演出水平愈来愈高。这是我所见过对早期豫剧发展最系统的梳理。

二是指导、支持《樊粹庭文集》出版，搞清古代豫剧向现代豫剧转型的轨迹。樊粹庭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冲破重重阻力，投身豫剧事业，创立“豫声戏剧学社”“狮吼剧团”，创建新的“编演机制”，以“进步戏剧观”对剧团进行系列改革。经过40年的不懈奋斗，终于“把豫剧提升为受众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之一”，使豫剧呈现出日新月异，成为豫剧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传奇人物。2012年河南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六卷本《樊粹庭文集》，王全书亲任编纂指导委员会主任。他热情洋溢地称赞樊先生“开启了中华豫剧的时空辉煌”，是“现代豫剧的奠基者和开路先锋”“现代豫剧之父”；称赞文集是“中华豫剧史上最具有动态历史感的集成式的戏剧宝典”，是“中华豫剧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一座巍峨丰碑”。在此基础上，豫剧才有新中国的辉煌。

第三，梳理中华豫剧的艺术门派，促进豫剧艺术百花齐放。在王全书的倡导支持下，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与河南有关部门策划编辑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豫剧资料。首先提及的是河大图文传播有限公司和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栏目共同策划、王全书作序的《豫剧名家六大家画传》。他热情洋溢地概括出六大名旦共有的“苦为艺术，情系人民，心向祖国的高尚情操”，准确地总结了各派唱腔的特点。王全书支持、策划出版《中原戏剧名家传记系列丛书》，写了总序，又为张秉义写的《桑振君传》单作序。此外还有“专题推介甘当无名英雄，居于幕后伴奏”的《中华豫剧板胡名家传略》，肯定了板胡在演出中的“托腔保调”作用。

第四，总结成功创作经验。为艺术家引领方向。现代豫剧经典《朝阳沟》莫属。戏曲的发展必以党的文艺方针为指引。在中华豫剧发展史上，《朝阳沟》火爆全国60年，长盛不衰，演出5000多场，是个传奇。而剧作者杨兰春却是在“七天內匆匆赶出的速成品”。王全书认为，此中的秘诀就是“厚积基础上的一次爆发”。它是作者“多年积淀的结果”，“速成”是现象，“厚积”是根基。演员高洁、马琳等的成功演出，也是在农村与农民“四同”的结果。这种经验总结，就是树立榜样，是用榜样为作家、演员深入生活指方向。

第五，继承“因人设戏”传统，身体力行，夯实豫剧高原，打造豫剧高峰。王全书在引领豫剧发展时，特别注重剧目质量，培养领军人物，夯实高原，构筑高峰。一是推介领军人物。“德艺双馨”的常香玉是他推介的“前无古人的豫剧艺术的巅峰”。她的德表现为：她把事业看得高于生命，“戏比天大”，四字可证；她情系人民，心里装着老百姓，其座右铭是“我的戏要跟着老百姓的脚步唱”，足迹遍及田野、矿山、油田、校园，一直唱到炮火连天的抗美援朝前线。她的“艺”表现为：坚信“艺无止境”，刻苦练功，博采众长，锐意创新，目标高远，“登上这一座高峰，又有更高的高峰在前面向你招手”。这是她的艺术，或者说中华豫剧不会“长白头”的原因。

二是“因人设戏”策划戏曲艺术名家精品系列。演员素质与剧中人格密切相关。王全书支持发挥唱腔和风格为名演员策划精品系列，以发挥唱腔在“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李树建是豫剧须生豫西派代表人物，唱腔苍凉浑厚，适宜演老生。王全书率先帮助他策划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豫剧三部曲”，《程婴救孤》表现忠，《清风亭上》表现孝，《苏武牧羊》表现节，刚刚推出的《义薄云天》表现义，成为“忠、孝、节、义”四部曲。之后李树建又热情地帮助、影响、带动了一批名家名角纷纷跟进。李树建也成了“继国务院唯一发文追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豫剧大师常香玉之后，又一位德艺双馨的中华豫剧领



《梨园芳华》

军人物”。

三是呕心沥血，精雕细刻经典节目。戏曲艺术成功与否，是以节目能否活在人民心中为标志的。他创意、指导、组织、推荐豫剧戏歌《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受命打造《村官李天成》，为创作《义薄云天》倾注大量心血。当他接受把村干部李天成的事迹搞成豫剧这一任务时，当机立断，提出创作、演出“要贯穿改革创新精神，实行剧组制”。他与大家协商，并引导大家达成共识：“大胆打破真人真事的局限，准确把握时代特点，严格遵循艺术规律”，使艺术形象“源于原型又脱胎于原型，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终于大获成功。其中的《百姓歌》演员唱得酣畅淋漓，观众听得荡气回肠，成了我党干部的“正气歌”。演出800场，被称为“当代《朝阳沟》”。

此外，再说几点感想。第一，王全书在豫剧发展道路上能够做到引领得当，阔步前进，硕果频出，根本原因是他讲政治，站位高；懂业务，把脉准；勤于拼搏，锐意创新；富有人格魅力，能以精辟的见解服人，以平易近人的作风凝聚人，以关爱、激励的办法调动人的积极性，用朴实的、带着浓烈泥土气息的语言循循善诱地开导人、鼓励人。他称赞李树建的“三部曲”是“有筋骨、有温度、沾泥土、带露珠的优秀作品”，是最接地气的农民语言。

第二，正确的工作定位才能有明显的引领效果。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的工作方针是“帮忙而不添乱，帮助而不替代，协作而不包办”。政治上把准方向，业务上不说话于人，自然不会添乱。亲自动手修改剧本，却不强加于人，而是让作家修改剧本做参考，就是“帮”而不“代”，“不包办”。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的科学定位，个人的真知灼见和谦恭态度，既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也迎来了中华豫剧发展的明媚春天。

目标定位也是引领，有目标方有动力。王全书为不同人、不同对象提出不同的奋斗目标充实了豫剧高原的厚土。他向李树建提出演《义薄云天》要“三超越”；对河南大学提出要培养“樊粹庭式”的人才；对《梨园春》提出要借鉴京剧“音像配”的形式进行“师声徒演”；希望《梨园春》“还本土评委为主导、占主体的本来面目”，“避免过度娱乐化、煽情化、综艺化的倾向”。中华豫剧的不断进步、水平日升，是在追求目标和克服不足的不断交互作用中实现的。

第三，戏剧是综合艺术，涉及范围广。20万字的《梨园芳华》言简意赅，涉及方方面面。相较于而言，对作家杨兰春和“梨园春”齐飞给予了重点评价。演员、剧目点名、评价更多。器乐有《板胡名家传略》，舞美基本没有提及。尤其对影响巨大的豫剧作曲王基笑没有文章，我感到是个遗憾。故建议本书再版时补入王基笑画传，适当评述舞美等其他戏剧元素的作用，以更全面地展现豫剧发展的本来面目。

《梨园芳华》内容之厚重，非一篇文章所能概括。谨以上述读后感，表达我的兴奋之情。（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曾任河南大学党委委员、中文系党委书记。文章发表时有删节。）